

四、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

论芬伯格对物化的再思考： 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①

刘光斌 施 瑾

摘要：芬伯格考察了自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物化理论形态。他着重分析了卢卡奇物化概念以及相关的四个观念，即客观形式、理性的元批判、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辩证法，并认为这些观念对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芬伯格把阿多诺、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物化观分别概括为同一性和非同一性关系中的物化、作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物化和作为承认遗忘的物化，他认为这些物化观既发展又误解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基于此，芬伯格认为有必要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进行再诠释，他把物化的商品逻辑扩展为技术逻辑，在技术的民主政治中寻求摆脱物化的途径。芬伯格自霍耐特之后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内重提物化主题，不仅强化了物化研究的当代价值，而且彰显了物化主题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地位。

最后，辩证法。芬伯格认为卢卡奇在恢复辩证法的总体性兴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认为一个系统的整体与构成整体的具体事实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这种总体性一方面是一种功能上的统一，在这种统一

①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启蒙辩证法》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7YBA094）成果。

中,每个制度和行动都被赋予了意义,在构成总体性中占有一定作用。从卢卡奇对物化的分析来看,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现象,也必须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进行分析,不能把物化看成是永恒的。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功能要素被他们无法完全控制的力量所控制。辩证法反映了形式和内容的矛盾、物化的制度和社会生活的现实的矛盾。芬伯格认为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辩证理论。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呈现,阿多诺主张不能完全用同一性逻辑取代非同一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与社会辩证关系进行了分析,但却悲观地认为启蒙变成了神话,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放弃了辩证法的作用。

关键词: 卢卡奇 芬伯格 法兰克福学派 物化

霍耐特在2005年做了题为《物化:一种承认理论的研究》的坦纳讲座,沉寂了多年的物化概念重新引起西方学界关注。受霍耐特的影响,芬伯格在2011年发表了《重新思考物化》一文,随后发表多篇以物化为主题的论文^①,在他看来,霍耐特不仅恢复了理论家长期忽略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而且认为物化仍然是这个时代的核心议题。不过芬伯格一方面赞同霍耐特的观点,认为物化是一种社会病理,“社会病理”即使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也必须得到解决,但另一方面他认为霍耐特主张物化是承认的遗忘的观点误解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这激起了芬伯格重新诠释物化概念的理论兴趣,他对卢卡奇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物化理论进行了再思考,在技术批判理论传统中重新考察物化概念,

① Andrew Feenberg. Rethinking Reification,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ed.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Andrew Feenberg. Why students of the Frankfurt will have to read Lukác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Theory*, ed. Michael J. Thomp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Andrew Feenberg. Lukács'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Rethinking Marxism*, 2015. Vol. 27, No. 4, 490-507.

提出了反物化的技术民主化思路并力图推进法兰克福学派物化理论的当代研究。

一、芬伯格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阐释

芬伯格明确提到他对卢卡奇物化概念的理解：“从字面上讲，卢卡奇所说的物化是指社会世界的‘事物化’。事实上，他认为社会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物。它是由人类的劳动和他们生活再生产之间流动的相互交往组成的。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交往是由物性逻辑（the logic of thinghood）构成的。”^①芬伯格认为卢卡奇主要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在社会过程中的物化，强调物性逻辑已经渗透到人类劳动和生活的交往之中，对卢卡奇来说，这里的“物性”一词有特定的含义：事实知识和技术控制的对象。芬伯格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当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明确指出卢卡奇物化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在重新思考物化概念的过程中，他重新诠释了卢卡奇物化概念，分析了卢卡奇对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影响。从逻辑上看，必先了解卢卡奇物化概念，才能更好地了解其物化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芬伯格对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再思考正是依据这一逻辑展开分析的。

芬伯格认为卢卡奇对物化的理解受到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他说：“卢卡奇试图通过创新的物化理论调和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②实际上，卢卡奇是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观念中衍生出一种与之相关的“物化”观念，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物与物关系的形式呈现出来，人们倾向于将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

① Andrew Feenberg. Why students of the Frankfurt will have to read Lukác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Theory*, ed. Michael J. Thomp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11.

② [加]安德鲁·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高海青译，金城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81 页。

“永恒化”,只能遵守社会规律,而不能改变它们。卢卡奇吸收了韦伯的形式合理性概念,把形式理性的合理化看成是物化。卢卡奇认为,在劳动过程中,人的劳动能力与任何物质生产工具一样都是可以计算的,于是,劳动者就变成了“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①,变成机器的附属物,他们的工作非人化,从这些意义上讲,人类的劳动能力可以说是物化的。卢卡奇认为商品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身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②,芬伯格把这一现象描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强加于社会世界的每一个方面,将社会进程冻结成僵化的形式,抵御大众的自主性。”^③可见,卢卡奇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韦伯合理化观点,结合普遍化的商品形式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

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芬伯格重点分析了卢卡奇物化理论中的四个观念,即客观形式、理性的元批判、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辩证法,并把这四个观念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结合起来,认为这些概念对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人的物化观念产生了影响。

首先,客观形式。芬伯格指出:“‘客观形式’这一新康德主义概念是卢卡奇的方法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哲学思想之间的重要桥梁。”^④客观形式指的是所有经验事物中存在的一般经验结构,即康德所说的事物是心灵活动的产物。芬伯格认为卢卡奇保留了康德关于物体取决于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4页。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8页。

③ Andrew Feenberg. Why students of the Frankfurt will have to read Lukác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Theory*, ed. Michael J. Thomp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11.

④ Andrew Feenberg. Why students of the Frankfurt will have to read Lukác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Theory*, ed. Michael J. Thomp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13.

主体强加的形式观点,但他认为卢卡奇所说的真正的主体不是人,而是资本主义以及在资本主义的经验世界中出现的商品形式,不同使用价值的物品必须在市场交换中取得商品形式。芬伯格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没有采用卢卡奇新康德主义立场,而是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地方,以卢卡奇的批判形式,发现了资本主义代理性和经验的普遍结构,把工具理性作为批判理论的批判形式。正如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强调:“世界的全面物化将合理性降为工具性的残渣。”^①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概念也类似于卢卡奇意义上的客观形式。按芬伯格的理解,从卢卡奇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客观形式发生了从商品形式到工具理性的转变,改变了人们理解物化的方式。

其次,理性的元批判。芬伯格指出:“理性的元批判,我是指抽象哲学范畴属于社会世界的证明。”^②也就是说,哲学批判与社会分析紧密联系,卢卡奇的元批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哲学范畴的先验范围表征着社会历史的时代特征。通俗地说,哲学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卢卡奇所处的社会中,商品取得了普遍化形式。近代理性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种功能,理性的元批判表明,工具理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合理化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哲学的“二律背反”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矛盾,而不是作为永恒的问题存在于时空之外。由工具理性带来的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具有资本主义制度逻辑的形式,同时又受到资本主义制度逻辑的限制。理性的元批判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反思和批判,正如阿多诺所说,“凭靠同一化,哲学和社会在哲学最

① Andrew Feenberg. Why students of the Frankfurt will have to read Lukác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Theory*, ed. Michael J. Thomp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13.

② Andrew Feenberg. Why students of the Frankfurt will have to read Lukác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Theory*, ed. Michael J. Thomp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14.

内在的核心中联系起来”^①。芬伯格认为马尔库塞采用技术理性展开发达工业社会批判,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他们都把哲学批判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

再次,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卢卡奇否认资本主义制度是完全合理性的,主张共产主义不是幻想,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植根于历史现实,即不是通过制度,而是通过群众抗议资本主义理性的非理性形式呈现出来。芬伯格认为在卢卡奇那里,理论与实践的本质联系这个问题关系到理论的实践本质,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反映了无产阶级实践的根本性质。卢卡奇声称,这种实践是对物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自发去除,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对应。无产阶级劳动与作为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最终通过无产阶级罢工和革命形式瓦解资本主义的经济物化形式,这种瓦解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进行的,它揭示了经济形式的人的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关系,而是一种共同的方法论策略,引导人们在物化的表象背后重新发现真正的人际关系。和卢卡奇一样,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也觉得有必要重新定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为两者必须表现为辩证统一关系。不过哈贝马斯虽然将批判理论与利益联系起来,但不再具体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他淡化了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从而使得他的解放理论缺乏对应的实践形式。

强调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并同时“对单向度”社会进行批判,认为一旦其矛盾不再通过抵抗表现出来,单向度社会就会盛行,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立场,反映出第一代批评理论家对回归到辩证立场充满怀疑。

^① [德]特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二、芬伯格对法兰克福学派物化观的分析

芬伯格对卢卡奇物化概念的重新解释是要正本清源，他对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物化理论的研究则是要指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物化观误解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芬伯格分别解释了阿多诺、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有关物化概念的论述，每一种阐释都与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存在关联，他们都认为物化是批判理论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概念。

芬伯格认为阿多诺从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关系中分析物化。芬伯格认为阿多诺和卢卡奇一样采用了理性的元批判，认为哲学批判与社会分析紧密联系。类似的观点在达姆斯那里得到印证，他认为阿多诺把物化看做一个非常具体的社会学概念：“在阿多诺的作品中。物化概念被重新阐述，目的是把它作为对当时流行的抽象思维的批判。以提高社会学研究的质量。”^①阿多诺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中，不同的事物被同化了，在交换过程中，它们都拥有同一个身份，即商品，以此造成的代价便是：“万物同一性的代价就是万物不能与自身认同。”^②在此情况下，人物化了，失去了个性，“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③。在阿多诺看来，物化遵循了同一性逻辑，商品的同一性逻辑掩盖了商品的非同一性，在哲学上表现为主体优先于客体，非同一性遭到了忽视。他认为阿多诺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物化概念。一方面，阿多诺追随卢卡奇，将物化视为一种异化形式，一种主体产生的

① 衣俊卿主编：《新马克思主义评论：超越物化的狂欢》，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8—299 页。

②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德] 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9 页。

③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德] 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22 页。

“客体的丧失”。按阿多诺的解释,“物化本身是虚假客观性的反映形式”^①,物化就是异化了的主体性获得了虚假的客观性。霍尔评价了阿多诺的观点:“潜藏在这一诊断之下的,是一个绝对主体(作为主客体同一的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它的自我实现或自由被认为存在于物化的客体性的整个过程中”^②。克服物化意味着人们认识到物化起源于人类的行动,无产阶级重新取得主体性地位。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阿多诺认为物化是以同一性的名义压制非同一性、异质性。在这个意义上,物化可以通过承认非同一性和接受客体的独立性、他者来克服。芬伯格认为:“阿多诺认为卢卡奇对物化的批判是对现代理性疏远效应的浪漫主义焦虑(romantic anxiety)的一种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他把物化解释为一种意识模式,被意识的反物化所克服,而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具体社会变化。‘与此同时,人类苦难的原因将在物化的悲叹中被掩盖而不是谴责’。”^③阿多诺从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关系来理解物化概念,把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解释为无产阶级被其物化为雇佣劳动的“概念”所压抑的“对象”。事实上,无产阶级的反抗并不像阿多诺所指责的那样是出于对客观性的反感,而是出于对其生活过程的限制,出于失业、饥饿和不公正被理解为劳动的商品形式的后果。可见阿多诺不同于卢卡奇,他已经无法正确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作用。

芬伯格认为哈贝马斯利用了卢卡奇的“客观形式”概念作为他自己的交往理性概念的先行条件,他把类似于“客观形式”的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结合起来考察物化,生活世界殖民化便是哈贝马斯对物化的新概括。哈贝马斯区分了“生活世界”和“系统”两种不同类型的行动

① [德]特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② 衣俊卿主编:《新马克思主义评论:超越物化的狂欢》,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③ Andrew Feenberg. *Why students of the Frankfurt will have to read Lukác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Theory*, ed. Michael J. Thomp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18.

协调机制,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划分表明两者都有各自的界限,生活世界通过相互理解协调行为,系统通过功能工具调节行为。现代社会取决于这些系统的有效协调,以减轻生活世界中过于复杂的任务的负担,然而随着系统功能的不断分化,系统干预了生活世界,交往理性被工具理性干预,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殖民化,与系统相适应的物化的人际关系不恰当地取代了以生活世界为基础的交往关系。哈贝马斯消除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中工具理性处于支配地位的问题,他把社会批判归结为划界问题,显然,系统本身是正常的,唯一的问题是它们侵入了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它确定了市场和行政管理的目标和范围,但在市场和行政干预下它无法实现民主化。芬伯格认为哈贝马斯承认卢卡奇关于商品拜物教如何在形式理性的生产组织中成为一个社会运作原则,这种分析表明策略性互动的政治和经济子系统从社会中分化出来,使社会整合出现了问题。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提供了一种物化理论的新版本,不过哈贝马斯并没有将无产阶级革命视为解决物化问题的方案。芬伯格注意到哈贝马斯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贡献,并指出其不足,他明确指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观点是对卢卡奇物化观点的修正,他说:“哈贝马斯也认识到物化的重要性。事实上,他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卢卡奇哲学的一次相当大的修正,他认为这一哲学与由于市场和官僚等‘制度’的理性化而产生的社会病理学是一致的。”^①但他认为哈贝马斯似乎承认专家能够恰当地解决所有技术问题,只要系统不越界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便是合理的。芬伯格评论道:“对专业知识的自主性的这种让步,使他们在倒掉洗澡水的时候也把婴儿倒掉了。而他们这样做,恰恰是在技术已

^① Andrew Feenberg. Why students of the Frankfurt will have to read Lukác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Theory*, ed. Michael J. Thomp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22.

经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时候。”^①芬伯格认为哈贝马斯物化理论的主要问题是虽然看到了专业知识自主性造成的影响,却放弃了技术通过政治行动产生激进转变的可能性。

芬伯格认为霍耐特沿着完全不同的路线恢复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霍耐特认为个人的态度和行为阻碍了对他人的承认,即承认的遗忘就是物化。承认的遗忘普遍存在时便会产生集体后果,也即社会病态。霍耐特在主题为《物化:一种承认理论的研究》(2005年)的讲座基础上出版了《物化:旧论新探》(2008年)一书,他着重从两个方面重新诠释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字面意义上的物化指“物化是指那些本来不具有事物属性,却被当作事物来认识和对待”^②,霍耐特坚持承认优先于认知,本体论意义的物化指“物化就是预先承认的遗忘”^③,他对物化概念的承认理论诠释使物化重新回到了理性论述的舞台。霍耐特对物化的上述理解是以重新检视卢卡奇物化概念为基础,他认为卢卡奇对物化发生的现象学描述十分正确,但无法对物化发生的过程进行适当地解释,因此,在当代要使物化这个旧概念重新发挥作用就必须赋予其新意。霍耐特对物化的再诠释,引起了芬伯格的关注,一方面芬伯格评价了霍耐特对物化研究的贡献,另一方面受霍耐特的理论启发,芬伯格激发了重新诠释物化的兴趣。首先,芬伯格高度评价了霍耐特对物化理论的贡献。芬伯格认为霍耐特把物化看成是一种社会病理,正确指出了卢卡奇采取客观态度研究物化,对当代社会中的物化问题做了新的判断。其次,芬伯格认为霍耐特对卢卡奇物化概念的承认理论解释存在限度,引起两种误解。一是霍耐特“援引了一个

① [加]安德鲁·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高海青译,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页。

② 刘光斌:《论霍耐特对物化批判的承认理论范式》,《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③ Axel Honneth. *Reification: A New Look at an Old Idea*. ed. Martin Ja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8.

‘与人类存在有关的’(existential)承认概念,作为对人的特殊品质的意识,他没有把这个概念与作为与其他人的理想关系的规范性的承认概念充分区别开来”^①。也就是说,霍耐特既主张存在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承认概念,强调承认优先于认知,又主张存在一个规范性的承认概念,他具体分析了爱、权利和团结三种承认规范关系,但在芬伯格看来,霍耐特没有严格区分。二是霍耐特在基于词根的字面意义上对物化的解释与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批判和解释这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不定。霍耐特确实提到坚持物化的字面意义:“我决心尽最大可能坚持这一概念的字面意义。”^②芬伯格认为霍耐特对卢卡奇将物化术语引入社会理论中的作用十分清楚,他不该将它与字面意义上的物化概念混淆起来。芬伯格指出霍耐特对物化的研究转向了对主体间承认关系的重视,“在强调承认的作用时,霍耐特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延续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方法”^③,但霍耐特的思考使他远离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

在芬伯格看来,霍耐特对物化的研究使这个过时了的概念在当代重新焕发了活力,物化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议题。不过芬伯格指出尽管缺乏承认是一种社会病理,但对卢卡奇而言,扭曲和压迫人类生活的理性结构的压倒性优势才是最大的社会病理,从人与结构的关系意义上说,霍耐特误解了卢卡奇物化概念,这促使芬伯格对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进行再思考。

① Andrew Feenberg. Rethinking Reification,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ed.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p. 102.

② [德]霍耐特:《对物化、认知、承认的几点误解》,《世界哲学》2012年第5期。

③ Andrew Feenberg. Rethinking Reification,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ed.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p. 111.

三、芬伯格对物化概念的新诠释

霍耐特对物化的再诠释,引发了芬伯格关注物化的兴趣。芬伯格指出知识史学家的艰巨任务在于解释那些不再可信的思想在过去享有的声望和影响力,而哲学家更困难的任务是在这些过时的思想中发现仍然可信地隐藏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核心观念,据此,他高度评价霍耐特的理论贡献:“霍耐特在他最近关于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坦纳讲座中承担了这一哲学任务。”^①不过,如上文所述,他认为霍耐特部分地误解了卢卡奇物化概念。

为了澄清霍耐特带来的误解,芬伯格认为有必要重温卢卡奇的一些论点,他主要关注了技术与物化的关系。芬伯格指出:“根据卢卡奇的说法,物化意味着把社会关系错误地看成是事物关系。”^②他认为这种解释是建立在把市场理性的批判扩展至科技理性的批判的结果,“卢卡奇引入了物化概念,以此将马克思最初对市场理性的批判扩展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理性这一主流文化形式的更为激进的批判”^③,在芬伯格看来,卢卡奇的物化实际上是指采取客观态度对待社会世界,认为社会世界是由技术操作规律支配的东西组成的。芬伯格基于这种认识进一步指出:“卢卡奇是左翼第一个对技术理性进行批判的人。”^④他认为最好把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解释为以对待自然的态度

① Andrew Feenberg. *Rethinking Reification,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ed.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p. 101.

② Feenberg, Andrew. Lukács'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Rethinking Marxism*, 2015,27(4).

③ [加]安德鲁·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高海青译,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页。

④ Feenberg, Andrew. Lukács'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Rethinking Marxism*, 2015,27(4).

的方式侵害了社会关系,他引用了卢卡奇的观点进行说明:“一方面,人的所有关系(作为社会行为的客体)越来越多地获得了自然科学概念结构的抽象因素的客观形式,即自然规律抽象基础的客观形式,另一方面,这个‘行为’的主体同样越来越对这些——人为地抽象了的——过程采取观察员,纯实验员的态度。”^①可见芬伯格对从技术层面重新解释卢卡奇物化概念产生了理论兴趣,他紧紧抓住物化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对卢卡奇物化概念进行了重新思考。

芬伯格把技术与物化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他指出卢卡奇把物化的社会现实视为“第二自然”,其法则与自然科学描述的第一自然一样。物化的主体以自然科学的模式解释社会现实,并在技术上对其起作用,技术操作是基于对法则(规律)的了解,而不是改变它们。正如卢卡奇所言:“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面对着的是由他自己(作为阶级)‘创造’的现实,即和他根本对立的‘自然’,他听凭它的‘规律’的摆布,它的活动只能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利益而利用个别规律的必然进程。但即使在这种‘活动’中,他也仍旧是——根据事物的本质——事件的客体,而不是主体。”^②这就是卢卡奇所说的,物化的实践反映了人与社会的直观关系。芬伯格部分地认同霍耐特对卢卡奇物化观的解释,即卢卡奇用客观化态度描述物化现象,并指出卢卡奇用来描述这种态度的词是“直观”,直观概念强调了人与社会之间的疏远和被动关系。他说:“《历史与阶级意识》并不批判日常意义上的直观,而是理解为技术上操纵世界关系的一个方面。”^③与霍耐特不同,芬伯格认为这种疏离与技术操纵有关,个人不能改变其规律,只能理解和操纵技术并运用这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08页。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13—214页。

③ Andrew Feenberg. *Rethinking Reification*,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ed.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p. 105.

些规律以达到个人利益。芬伯格认为“技术是卢卡奇物化的一个重要例子和来源”^①,技术在社会结构和人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从理论上解释被困在压迫性经济、行政和技术结构中的人的本质问题。芬伯格在卢卡奇的论述中,看到了物化与技术批判的关系,认为从技术层面重新解释物化具有应用价值:“如果说物化,我们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形式和相关的技术配置,那么这个概念显然仍然有着有趣的应用。”^②

芬伯格进一步分析了把物化和技术结合起来的原因。他认为这与当代社会运动及其与技术的紧密联系有关,当代激进运动,如环境运动和基于性别的运动,在卢卡奇的意义并不是革命性的。但芬伯格认为这恰恰是我们重新理解物化概念的新社会背景,而且许多运动都涉及到技术和其他技术中介系统的斗争,这些争论通过挑战资本主义对技术知识的应用间接地提出了权力问题。芬伯格认为当代社会运动与技术应用紧密相关,技术中介已经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芬伯格举例进行了说明:“政府官僚机构使用越来越复杂的计算机技术,并且越来越受到模仿市场运作的问责制形式的制约。市场越来越依赖于通信技术实现全球化,而生产则由高度官僚化的管理层组织。这些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往往会创造一个越来越技术化的社会理性系统,并传播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③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技术形式已经取代商品形式成为物化产生的原因,技术官僚制将其限制性的生活形式强加

① Andrew Feenberg. Rethinking Reification,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ed.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p. 102.

② Andrew Feenberg. Rethinking Reification,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ed.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p. 111.

③ Andrew Feenberg. Rethinking Reification,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ed.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p. 112.

给有能力为自己利益而抵抗的人民，正如卢卡奇时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被强加给有抵抗力的工人阶级，在芬伯格对物化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把物化与技术结合起来的原因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物化的技术逻辑取代了物化的商品逻辑。

芬伯格认为现代技术构成了物化和反物化的中介，现代技术既构成了物化的原因，也蕴含着摆脱物化的出路。芬伯格认为反物化的方案就在现代技术之中，他主张技术民主化，认为“技术化世界的民主化就是反物化(dereification)”^①，技术民主化要求把技术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发挥普通大众在技术设计和决策中的作用。芬伯格认为这种改变的物化的政治要求，在卢卡奇那里也能找到依据，他说：“卢卡奇设想了一种反物化的政治。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主张，先于物化形式的人的现实能够重新肯定自身并且改变社会。”^②芬伯格把现代技术视为物化和反物化的中介，是因为他注意到了技术政治的辩证法，技术包含了统治的一面，也包含解放的一面。芬伯格指出：“当前的技术体系不仅符合人类的普遍利益，而且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要求。”^③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技术的选择和决策深受资本主义阶级利益的强烈影响，在技术发展的制度结构中，技术对工人、消费者的福利漠不关心，这是因为资本家及其代表拥有经营自主权，他们掌握了技术代码。同时，正因为这些漠不关心构成了当前技术斗争的背景，技术的传播和官僚行政打开了其他斗争的局面，人们可以通过技术的民主干预，重新设计技术为人类和自然服务。芬伯格认为以追

① Andrew Feenberg. Rethinking Reification,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ed.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p. 102.

② 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高海青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215页。

③ Andrew Feenberg. Rethinking Reification,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ed.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p. 116.

求技术民主化为目标的技术斗争已经在很多领域发生,涉及环境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互联网等,技术斗争采取了从黑客攻击到诉讼、消费者抵制,再到抗议和示威等手段。尽管这些社会运动与和平、民权、税收等重大问题相比,它们显得软弱甚至微不足道,然而,随着普通人在技术体系中参与技术代码的设计,“技术先进社会的性质正在逐渐发生变化”^①。这些代码等同于法规,在物化的视野下,技术行动必须符合技术操作规则,但是反物化意味着可以修改这些规则,使之符合人类的需要。芬伯格指出:“我们才刚刚开始对技术进行民主干预。最终的调整可能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②正如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突破了物化的表象,对技术官僚思想的抵制构成了一种新的传播形式,这种传播形式植根于技术社会的日常经验,通过改变技术规范间接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从技术和规范的角度来批判物化,在公众被系统性地剥夺权力的地方展开斗争,以技术规范为基础继承技术系统,改进技术法规,如此一来,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变革能引领一场技术领域的激进改革,这有利于形成民主的技术政治。芬伯格指出:“这些思考表明,卢卡奇中期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并没有耗尽。他们对理性的批判可以帮助我们再次理解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形势,这次不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也不是在反乌托邦式的进步批判中,而是通过发展技术政治的民主含义。”^③

① Andrew Feenberg. Rethinking Reification,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ed.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p. 116.

② Andrew Feenberg. Rethinking Reification,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ed.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p. 117.

③ Andrew Feenberg. Rethinking Reification,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ed.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p. 118.

四、评芬伯格对物化的再思考

芬伯格在当代重新解释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并分析了物化自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演变。“我打算以类似于其本来意义的方式来阐述卢卡奇论证的核心，并研究其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意义。”^①物化理论自卢卡奇到阿多诺、哈贝马斯、霍耐特到芬伯格的演变，表明当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深受卢卡奇的影响。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的观点，芬伯格从技术层面着重分析了社会结构与人关系中产生的物化现象，对卢卡奇物化概念进行了重新思考，着重把握了物化概念与技术批判之间的关系，赋予物化新的内涵。芬伯格在霍耐特之后继续推进了卢卡奇物化理论研究，和霍耐特一起推动了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物化理论的研究，也再现了物化议题在当代研究的理论意义。

由于社会情境变化及思想家们理论关注点不同，物化概念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表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对卢卡奇物化概念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他们的研究转变了卢卡奇物化研究的理论视域。芬伯格不仅再思考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而且概括出阿多诺、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人的物化理论模式，他指出卢卡奇物化理论中的四个观点——客观形式、理性的元批判、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辩证法——对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物化和批判理论产生的重要影响。据此，芬伯格进一步指出阿多诺等人的物化理论已经失去了早期卢卡奇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激进立场。

芬伯格认为现代社会关系都以技术为中介，随着技术中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产生了技术的矛盾也带来了技术转化的潜能，

^① Andrew Feenberg. Why students of the Frankfurt will have to read Lukác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Theory*, ed. Michael J. Thomp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11.

借用马尔库塞的话说：“‘技术已经变成物化’的主要工具和‘科学和技术是解放的主要工具’。”^①在芬伯格看来，使技术发展接受更广泛的价值的影响是一项需要广泛的民主参与的技术规划。需要指出的是，芬伯格虽然提出了摆脱物化的技术民主化的方案，但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一样，他的技术民主政治观基本上放弃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总体性革命的主张，正如他所说，就物化批判而言，“目标不是革命，而是现代生活中微小但重大的变化，我称之为‘民主合理化’”^②。或者说，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方案主张渐进改革，通过具体的小范围的政治抗议形式，改变特定的技术以改善生活环境，这是一种“微政治学”^③。柯克帕特里克认为芬伯格夸大了技术民主化程度，他指出：“芬伯格倾向于夸大技术民主化的程度：他所说的技术边界可以移动，但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可改变的特性，限制了大众参与。”^④也就是说，柯克帕特里克认为技术边界是难以改变的，它限制了大众参与，言下之意，通过公众参与技术设计来干预技术并改变技术规范面临较大的困难，因此，芬伯格关于“技术化世界的民主化就是反物化”^⑤的主张有些乐观了。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 ① [加]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 ② Feenberg, Andrew. Lukács'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Rethinking Marxism*, 2015, 27(4).
- ③ [加]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 ④ Gramemne Kirkpatrick. Transforming Dystopia with Democracy: The Technical Code and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Thought of Andrew Feenberg*, ed. Andreas Miche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19.
- ⑤ Andrew Feenberg. Rethinking Reification,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ed.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p. 102.

On Feenberg's Reconsideration of Reification: From Lukács to Frankfurt School

LIU Guang-bin, SHI Jin

Abstract: Feenberg analyzed the theories of reification which were from Lukacs to Frankfurt School. He analyzed the origin of Lukac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nd four concepts, these concepts are form of objectivity, metacritique of reason,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dialectical method which affected the Frankfurt School; He further analyzed the reific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ntity and the nonidentity of Adorno, Habermas's reification as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 world, Honneth's reification as forgetting of recognition. Feenberg reflected the reification from Lukács to Frankfurt School, He reinterpreted Lukacs' theory of reification, expanded the logic of goods to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of reification, and sought a way to dereification in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of technology. Feenberg explained the reification in the critical theory tradition of Frankfurt school following Honneth, He not only strengthene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study of reification, but also showed the position of the reification in the critical theory of Frankfurt school.

Key words: Lukács; Feenberg; Frankfurt School; Reification